

· 历史研究 ·

# 土耳其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杜 军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伊朗与土耳其两国都是中东地区具有重要地位的地区性大国。因而两国关系对中东地区的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1979年伊朗什叶派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结束了巴列维王朝在伊朗的统治。两国在此之前的密切关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伊朗新政权建立后实施了较为激进的伊斯兰化的外交政策。虽然伊朗的外交政策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土耳其政府在伊朗革命不久便迅速承认了霍梅尼政权。土耳其还以克制的态度对待伊朗的激进政策。并且拒绝与美国一道制裁伊朗。总体上来看,两国关系在伊朗革命的危机当中平稳度过,而且为土耳其政府在随后的两伊战争中的中立政策打下了基础。

【关键词】 霍梅尼; 伊朗; 土耳其; 关系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3492( 2008) 11- 0132- 02

作者简介: 杜军,男,宁夏隆德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史。

## 一、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 (一)霍梅尼政权对外政策的伊斯兰化

1979年伊朗爆发了以霍梅尼为宗教领袖的伊斯兰革命。腐朽没落的巴列维王朝在声势浩大的革命面前摇摇欲坠。不久,于4月1日,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从此,伊朗历史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后,霍梅尼利用自己作为革命最高领袖的威望和地位建立国家政治、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制度,在国内推行“全盘伊斯兰化”的政策。这项政策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化领域的伊斯兰化。伊朗“外交政策伊斯兰化体现为激进的第三世界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即所谓‘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sup>[1]</sup>霍梅尼政权将美国视为“大撒旦”,是伊斯兰民族的压迫者和敌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被伊朗视为异己,伊朗执政党伊斯兰共和党在党纲中将苏联称为“社会帝国主义”。霍梅尼还强调伊斯兰世界的一体性,主张泛伊斯兰主义。并且宣称将向世界各地输出伊朗式的革命。“为此伊朗当局成立‘全球革命部’,联络和支持世界各地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运动。”<sup>[2]</sup>

霍梅尼在他的论著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阐述了他鲜明的外交理念。他宣扬伊斯兰国际主义立场。即“发展和加强伊斯兰的兄弟关系和全体人民之间的互助关系,以伊斯兰准则为基础来建立伊朗的外交政策,对所有伊斯兰人民行使兄弟般的职责,全力支持世界上的弱者。他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伊朗伊斯兰政府的模式是世界被压迫世界最适合的模式应当将其传播到伊朗以外的地方。

“伊朗革命在中东建立了第一个由宗教人士控制的政权,这一事件鼓舞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向其他中东穆斯林国家发起进攻。霍梅尼指出,凡不是像伊朗那样由宗教人士直接掌权的国家,其政府都是腐化和专制的政府,应该予以推翻。”<sup>[3]</sup>他一再宣称如果伊朗不输出革命,伊朗的革命就不会胜利。为此,霍梅尼政府将全世界穆斯林国家的反对派领导人召集到德黑兰,一起讨论世界伊斯兰革命问题。

伊朗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这场革命不久也对土耳其国内的伊斯兰复兴组织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霍梅尼政权把土耳其共和国的开国之父凯末尔看做是与伊朗前国王同一类型的人,伊朗对土耳其实行的政教分离的世俗体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且鼓励土耳其国内的宗教阶层起来反对土耳其的世俗化,希望他们能够用实际行动动摇在土耳其实行了半个世纪的世俗体制。由此可见,从伊朗本土刮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风潮已经对土耳其产生了影响。

### (二)土耳其对伊朗革命的态度

伊朗革命胜利之后,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特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对土耳其的世俗政治体制构成了挑战。一方面,以霍梅尼为核心的伊朗新政权不断利用各种场合对土耳其政府进行抨击与批评。由于伊朗革命之后,美国与伊朗两国关系急剧恶化,霍梅尼政权把土耳其政府视为美国中东政策的忠实奴仆与代理人而且对土耳其的政治制度进了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的宗教阶层以及伊斯兰复兴势力在伊朗革命取得胜利的鼓舞之下呈现出上升势头。“土耳其的极端的伊斯兰宗教组织公开反对世俗政权,并要求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和社会伊斯兰化。”<sup>[4]</sup>因此,土耳其政府如何应对伊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土耳其的影响以及对待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态度就显得至关重要。然而土耳其政府的态度却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吃惊。

#### 1. 土耳其政府承认伊朗新政权

“土耳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正式承认革命政权的国家之一。在1979年2月13日新政府建立48小时内土耳其对伊朗政权予以承认。土耳其动作如此之快的原因是为了向德黑兰表明土耳其将恪守它与伊朗和平共处的传统政策。”<sup>[5]</sup>

霍梅尼政权成立之后,土耳其主流媒体曾提醒政府不要承认伊朗的新政权。因为它认为伊朗新政权很可能接下来决定向土耳其输出革命当时土耳其知名的米里耶特日报曾发表这样的评论:“以土耳其的立场在对局势作出评价之前静观局势的发展似乎是不可取的……由于有太多未知的因素影响伊朗。它的解

决遥遥无期,在过去的三个月当中已变得极其复杂。”<sup>[6]</sup>而当时的土耳其的执政党社会民主人民共和党领导人、时任总理的布伦特·埃杰维特对媒体的这些警告未予理会并且对伊朗新政府给予了正式的承认。埃杰维特在给伊朗临时政府首相巴尔扎甘传达的信息中强调土耳其十分重视发展与伊朗新政府的关系。他还向霍梅尼保证土耳其没有干涉伊朗内政的打算而且建议其它国家也不要干涉伊朗内政。

1979年4月,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在接受一位土耳其媒体记者采访时说“中东和平需要‘保持伊朗的统一’,因此土耳其对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很感兴趣。”<sup>[7]</sup>

## 2 土耳其对伊朗挑战的克制

霍梅尼政权在伊朗上台执政之后,土耳其国内极端的伊斯兰宗教组织和派别纷纷跃跃欲试试图推翻土耳其的世俗政权以伊朗新的伊斯兰政权为样板建立一个伊斯兰化的土耳其国家。“时任原教旨主义性质的民族拯救党(NSP)党魁的内吉姆丁·厄尔巴坎对伊朗革命给予了赞扬。他发表讲话称阿亚图拉霍梅尼将伊朗人民从美国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而且土耳其人应当同样行动起来摆脱美国的控制。”<sup>[8]</sup>虽然土耳其媒体声称土国内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但土耳其的回应只是将一些激进分子逮捕,而伊朗是否参与支持这些激进组织的做法也无法得到证实。

另一方面,伊朗的德黑兰之声利用广播这一载体经常抨击凯末尔以及土耳其的世俗主义的国家理念。另外,霍梅尼本人经常发表讲话,他把土耳其政府称作是非法性质的政府。伊朗的一些外交官以及政府官员还在各种场合发表攻击凯末尔的言论。他们甚至还“一致决定拒绝拜谒阿塔图克(凯末尔)的陵墓。而它是其它国家官员访问土耳其的常设的去处。”<sup>[9]</sup>

面对国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头的升温以及伊朗的口诛笔伐,土耳其政府一方面对国内的激进组织与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打击而另一方面却对来自伊朗的伊斯兰宣传攻势不多作回应。土耳其国内对伊朗的做法反应比较激烈的则是土耳其的媒体。它们认为霍梅尼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毛拉”。一旦伊朗对土耳其的世俗体制进行攻击或者是进行煽动土国内的宗教势力的作法,土耳其媒体便会会对伊朗作出强烈的反应。与土耳其媒体的态度相比,土耳其政府的态度就显得非常克制。例如,当“人质危机”发生之后,土耳其总理德米雷尔立即命令土耳其外交人员的家属撤离德黑兰。他在随后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伊朗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并对此深感遗憾。伊朗立即对德米雷尔的讲话进行了谴责。霍梅尼在接受几名外国记者采访时再次对土耳其进行指责。但是除了这个防备的举措之外,德米雷尔没有对霍梅尼的挑衅性言论作出回应。另外,虽然土耳其允许美国飞机从土耳其起飞去营救被扣为人质的美国人,但土耳其政府对这一行动作了限制。土耳其政府的条件是有伊朗当局准许必要的入境许可还有除了直升机机组人员之外其他人员不得登机。并且只运送在伊朗服役的美国人员及其家属。不得从土耳其向伊朗运送军事设备。

## 3 土耳其拒绝制裁伊朗

“1979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美国与伊朗霍梅尼政权立

即剑拔弩张,互为仇敌。”<sup>[10]</sup>同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包围了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将美国使馆人员扣为人质。他们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并将巴列维王室在美国的财产归还伊朗。“人质危机”发生之后,卡特政府随即宣布“冻结伊朗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并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sup>[11]</sup>1980年4月,美国要求土耳其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支持美国的制裁。在面对可能被世界市场孤立的严峻形势之下,伊朗外长霍特卜扎德告知土耳其政府应当拒绝参与美国制裁伊朗的行动。他认为伊土两国应该继续在极其广泛的范围内展开经济合作。

1980年4月19日,土耳其外交部正式宣布“土耳其已向美方就土耳其与伊朗关系的特殊本质做出了解释并且安卡拉将不会实施任何制裁措施。”<sup>[12]</sup>土耳其认为孤立伊朗无益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因此,土耳其拒绝参加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

土耳其政府之所以对霍梅尼政权作出这样的回应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土耳其担心伊朗新政权落入苏联之手。因为伊朗革命发生的背景仍然是美苏冷战的大环境之下,作为身兼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忠实盟友以及中东地区唯一一个有伊斯兰背景的北约成员国而言,土耳其优先考虑的还是遏制苏联势力在中东的扩张。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重要的战略支柱国家,土耳其始终把遏制苏联放在第一位。另外,自土耳其建国以来,历届政府都坚持反共政策。“土耳其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共立场,以及对苏联的疑虑和不信任,无疑起到了自己恶化与苏联关系的消极作用。”<sup>[13]</sup>土耳其害怕在伊朗发生政权更迭之时,苏联趁火打劫并且对伊朗局势横加干涉。土耳其认为苏联军队在伊朗北部的存在或者伊朗的分裂将意味着这一地区的不稳定。因为“土耳其认为这样会给土耳其带来附加的安全问题而且会被土耳其库尔德分裂势力大加利用。”<sup>[14]</sup>

其次,土耳其对自身曾遭受过的政治孤立心有余悸。“在中东地区受孤立的经历促使土耳其推行中立与不干涉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政策。许多土耳其人深信土耳其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支持激起了阿拉伯人的反对并导致了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孤立。”<sup>[15]</sup>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耳其与希腊两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针锋相对,因而土耳其政府认为希土两国的争端令其精疲力竭,完全没有必要对伊朗革命作出激烈的反应甚至对伊朗革命进行干涉。

最后,土耳其的世俗性质的体制从根本上难以撼动。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土耳其历届政府都秉承凯末尔主义的旗帜。而世俗主义正是凯末尔主义的六项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直到今日仍然为土耳其共和国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sup>[16]</sup>另外,土耳其军队是土耳其保持世俗化特点的坚固堡垒。土耳其军队在保卫世俗共和政权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土耳其的精英们相信土耳其世俗化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和强大的凯末尔主义传统能抵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sup>[17]</sup>而当霍梅尼政权对外政策方面伊斯兰化之后,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纷纷迅速作出反应以应对伊朗输出革命的口号。1981年5月由海湾六国成立的海湾合作委员会的目的之一就是防止伊朗输出革命。由此可以看出土耳其的态度与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朗革命之后不(下转第143页)

强烈。和谐型文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内耗型文化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人作为文化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承载着文化生产力的主体内容。所以,充分落实人本理念,大力弘扬人文精神,积极繁荣和发展和谐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主要是要牢牢把握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以追求个性鼓励创意为特色,形成科学的文化产业格局、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

为适应当前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大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必须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构建和谐文化制度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制度保障。文化制度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组织机构和体系。和谐文化制度则是指将和谐文化的精神实质应用于文化制度而建构形成的分工合作、协调运转、行之有效的文化体系。和谐文化制度并非单纯的条条框框,而是根植于人们内心的鲜活的潜在规则,是由和谐文化内生的一整套圆融和合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文化制度实质上也是文化,是一种制度文化。而任何文化,归根到底都体现着人的意志和精神。和谐的制度文化,必定需要社会理想和时代精神的支撑。所以,构建和谐文化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的制度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它决定着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支配和领导的地位。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和主导,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的制度文化是不可能的。

第二,构建和谐文化制度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概括为“四个坚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社会主

义荣辱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它决定了我国文化制度的社会性质。排除文化形态性质而言,我们要构建的和谐文化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文化制度。和谐社会是一种社会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因此和谐文化制度也是一种文化状态,而不是一种文化形态。作为一种文化状态的和谐文化制度,意味着它是一种反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由社会主义社会中多种多样的文化相互协调构成的和谐的文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的利益关系、活动方式和思想观念由单一走向多样,这在文化生活中表现得特别充分。这些多种多样的文化,可以形成有序的状态,也可以呈现无序的状态,甚至可能呈现内耗状态。对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文化,我们要在辨别中引导,在引导中协调,在协调中整合。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强调指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只有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通过科学合理的文化制度建设,才能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文化协调、整合成为一种和谐文化,即“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协调、整合社会生活中多样文化的根本所在。

和谐是美,是一种精神力量,和谐文化制度建设本身必然内含着特定的人文精神和文化魅力。因此,加强和谐文化制度建设,必定会进一步升华我们对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的目标模式和价值取向的认识,最终有利于达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下的多元文化的和谐统一,进而在全球化浪潮下推动我国文化生产力和国家软实力得以更好地弘扬和拓展,并为迎接一个崭新的中国特色文明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

[收稿日期] 2008-06-02

[责任编辑:王望]

(上接第 133 页)久,土耳其总理埃杰维特丝毫不担心伊朗革命会波及土耳其。他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伊朗革命对土耳其的影响时,认为“一个世俗国家的概念已经在土耳其建立起来了……我不会给反对世俗化的运动一丁点的空间。”<sup>[18]</sup>所以在整个中东地区而言,伊朗革命对阿拉伯的国家的威胁远比土耳其的要大。

从总体上来看,伊朗与土耳其两国平稳的度过了伊朗革命对两国的冲击。土耳其政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妥善的处理两国间的分歧与矛盾从而使两国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事实证明,土耳其对伊朗革命的态度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它不仅化解了两国因革命而产生的冲突而且也为后来土耳其在两伊战争中的中立政策打下了基础。

[收稿日期] 2008-07-15

#### 参考文献

- [1] 王彤. 当代中东政治制度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73
- [2] C. 伯纳德、Z. 哈利尔扎德. “神治——伊朗的伊斯兰共和国”(Cheryl Benard and Zahay Khalilzad “The Government of God”——Iran’s Islamic Republic,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4). 148—155; 米拉尼

.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产生, 203. 转引自王彤. 当代中东政治制度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73

[3] 彭树智. 二十世纪中东史 [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410.

[4] 张铁伟. 列国志·伊朗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329

[5] [8] [9] [18] Suha Bolukbasi “Turkey Copes With Revolutionary Iran”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3 nos 1&2 (1989): 94—109

[6] Milliyet (Turkish daily), 13 February 1979, p 1. From Suha Bolukbasi “Turkey Copes With Revolutionary Iran.”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3 nos 1&2 (1989): 94—109

[7] FBIS/W. E., 19 March 1979 p. T1. From Suha Bolukbasi “Turkey Copes With Revolutionary Iran”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3 nos 1&2 (1989): 94—109.

[10] [15] [17] 肖宪, 伍庆玲, 吴磊. 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 [M]. 时事出版社, 2006: 178 178 179.

[11] 赵伟明. 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 [M]. 时事出版社, 2006: 215

[12] FBIS/W. E., 21 April 1980 p. T1. From Suha Bolukbasi “Turkey Copes With Revolutionary Iran”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3, nos 1&2 (1989): 94—109

[13] 黄维民.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 [M]. 商务印书馆, 2005: 236 204

[14] Suha Bolukbasi “Turkey Copes With Revolutionary Iran”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13, nos 1&2 (1989).

[责任编辑: 贺永泉]